

海坨山区抗日军民的战斗与生活

孟宪昌

史事经纬

北京市和河北省交界的海坨山，平北要津，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平北地委、八路军平北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。1938年后，八路军三次派兵挺进这一地区，建立并发展了以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抗日根据地。生活在海坨山区的平北党政军机关领导当地军民，同仇敌愾，众志成城，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的“蚕食”，在粉碎敌人“扫荡”“蚕食”、消灭了大批敌人的同时，还战胜了饥饿、寒冷、疾病等艰难困苦，顽强生存，屡战屡捷，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。

群众承担起干部战士的衣、食、住

以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，由于当地无法筹集到大批布料，干部战士的服装要从其他抗日根据地“输入”，但不久就遭到了敌人的封锁。1940年9月，海坨山区突然气温骤降，干部战士面临着“大雪北风寒，战士衣正单”的严重局面。此时，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刘开锡率队攻克了敌人长安岭据点，缴获了一批土白布，便立即运到海坨山。为了让子弟兵早日穿上冬装，大海坨村村长李万义在院子支起大铁锅，部分群众纷纷从家中灶炕收集了草木灰，从山上采到粘染土代替染料，夜以继日地煮制，终于将白布染成了浅灰色；其他群众则到处收集棉花和牛毛、羊毛，不少群众将自己衣服上的双层破棉絮揭下一层送给战士们。有了材料，根据地中心区十几个村的妇女立即组织起来，日夜加班，挑灯赶制，很快为子弟兵赶制出棉衣。其间，海坨山群众又纷纷献出家中的材料，组织工匠赶制一批毡毡毛帽子，中心区每位妇女做出12双军鞋。为了减轻群众负担，部队战士在战斗间隙集体纺织袜子。入冬后，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，部队的冬装得到了解决。

由于敌人的封锁，粮食很难运进海坨山区，山区的群众便把省下的粮食交给部队。在部队宿营时，群众就热情地把战士们接到自己家中共同就餐。有的群众宁可自己吃糠咽菜，也要把仅有的几筐土豆送



转战长城内外的八路军平北部队

给八路军指战员。1942至1943年期间，敌人对海坨山抗日根据地连续发起大规模“扫荡”，企图将抗日军民彻底“困死、饿死”。八路军和群众与来犯敌人“转山头、捉迷藏”，巧妙地与敌周旋于密林深山，伺机打击敌人，饿了就摘山果、挖野菜、捋树叶充饥。榛子、橡子、山荆、野莓、欧粒、野葱、小蒜都成了抗日军民口中的美味佳肴。

八路军刚来到海坨山区时，群众都会把子弟兵让进家中宿营，天冷了，不少群众还把热炕腾出，自己睡在地上的秸草里，让八路军指战员非常感动。为了不让群众添麻烦，八路军指战员就在山里搭起马架窝棚居住。为了抗寒，八路军把梯田挖成“炕”：选一处台阶拆了，往里挖一条沟，沟面上盖石板抹上一层泥，烧干后支上帐篷。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、龙延环联合县长蔡平干脆住进海坨山上的自然石洞中办公。敌人“扫荡”时，将群众的房子烧毁。粉碎“扫荡”后，八路军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群众盖房子。战士们平时收集斧、凿、锯，和群众一起从山上砍来树，窗户用木条钉，糊上纸，堵有洞用泥堵上，门口挂着自己编的草帘。敌人白天烧了房，经过军民的努力，到晚上就又能住人了。

军民共建修械所与炸弹厂

八路军刚刚进入海坨山时，携带着一定的武器弹药。战斗中，八路军虽然能从敌人手里缴获一些武器弹药，但远远不能满足战斗的需要。由于敌人的封锁，从其他根据地获得补给也越来越困难。为此，军分区从群众中动员了一批能工巧匠，又想方设法“凑”了点简单的设备，再通过地下关系“从敌人据点买了点儿程水之类急需物品”，然后由石堡子山中建立了修械所，对枪支进行修理。为了制造出杀伤性更大的武器，修械所的工匠就因地制宜，动员各村乡亲们捐献烧炭，然

后在老庙地、杨树河一带山中，建起一座小型炸弹厂，再按照“土洋结合”专门铸造地雷、手榴弹。没火药就发动当地群众熬制，碾轧、配制。为了省铁，工匠们还将石头凿凿，制成石雷。就这样，炸弹厂白手起家，制出了一批批地雷手榴弹运往前线，杀伤了大量敌人。

无微不至地照料子弟伤病员

1940年夏，平北抗日根据地刚刚开辟，八路军部队没有医院、卫生所，伤病员全都寄养在群众家中，生活、治疗也都由群众帮助解决。最典型的代表，要数龙赤联合县五区的拥军模范赵顺。他腾出自己的房子，为部队开设了临时诊所，日夜照料伤病员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赵顺一有时间就领上女儿、儿媳上山采草药。大批伤病员经过他的精心照顾，痊愈后重新走上前线。

随着形势的发展，海坨山区的机关干部、部队战士日益增加，反“扫荡”斗争中伤员也逐渐增多。1941年，军分区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在黑龙潭建起了后方医院，并聘请一批有医学知识的群众进入医院帮助医务工作者照看伤病员。后方医院的很多药品还是在医院帮忙的群众通过关系、熟人从北平等大城市秘密购买并运回根据地的。每当敌人“扫荡”，群众便会在医生的指导下搀扶或者抬着伤病员转移到深山密林深处。

《挺进报》：在根据地群众中产生了广泛、深远的影响

为了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，沟通各方面信息，鼓舞军民抗日热情，加强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宣传建设，1941年初，平北军分区政治部决定创办军分区机关报——《铁军报》。

办报没有专业人员，经组织决定，由赵科长徐辉、勤奸科长朱静轩及干事王济、郭振普兼职。没有设备，报社的同志便利用战斗在敌伪军中的内线关系，买齐了油印机、油墨、蜡纸、白

纸等办报用品。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，报社又通过群众，采用“蚂蚁搬家”的办法，将各种物品和设备拆开，然后一点一点秘密运回海坨山。没有安静、隐蔽的场所，办报人员便请教群众，最终在群众的指引下，在纪宁堡的大山深处找到一处破旧简陋的庙宇（实际上是只有一个道士居住的土房）。报社编辑、记者和道士一起居住，没有桌子，写稿时就在纸张下垫一块木板，放在双膝上当桌子；刻版时就趴在土炕上；印刷时，没有架子，就搭几块山石。周边群众有时也会过来帮忙。经过一番努力，《铁军报》终于如期得以出版，被交通员和群众分送根据地各地。

1941年底，由于敌人加紧封锁，导致原材料供应不足，《铁军报》因此停刊。1942年2月和5月，诞生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《挺进报》，奉上上级指示，集合报社的全部人马——社长、编辑、采购、发行共20多人，携带全部家当：一部收报机、一架油印机、两块钢板及个人的办公用品，分两批从平西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，千辛万苦来到中共平北地委所在地——海坨山的西坡。

《挺进报》报纸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新闻稿外，主要是刊登平北根据地的新闻和评论文章，其内容都紧密地结合着当时各方面的斗争，与根据地干部、战士和群众密切相关。

《挺进报》除派记者随军战斗和采访外，还在根据地干部、小学教师、部队指战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组织起通讯网。由于有了群众性的通讯员队伍，地方新闻稿件源源不断地投到报社。工农通讯员的热情很高，反映的问题也很重要，但受限于文化水平，写的稿子不容易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。有些农民和村干部自己写不了稿子，就把看到的事情讲给小学教员听，请他们代笔，写好后寄给报社。每当遇到这种情况，报社文书就耐心帮助重新改写；报纸出版后，报社尽快把刊登作者稿件的报纸寄给作者。这些举措，不仅使《挺进报》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、深远的影响，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群众学习抗战文化、参与抗战文化建设的积极性。

《挺进报》迁到平北之后，由于环境残酷，在一个时期内，只能用油印出版，但还是基本上坚持了三日一刊。报纸出版后，除分区、县、区三级党政群机关和部队外，还送到北平郊区及张家口、承德附近（包括昌平、顺义、怀柔、密云、丰宁、滦平、延庆、怀来、宣化、龙关、赤城、崇礼、沽源、宝昌等县的广大农村）。每份报纸都是辗转传阅，海坨山区出发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常把几份报纸带在身边，宿营时就拿出来，给群众宣读、传阅，让群众尽快了解到胜利的消息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省赤城县政协文史委）

长、连长各1名。

12月，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旅六八五团挺进山东，到达湖西地区单县、丰县边境。为了稳定局势，巩固和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，六八五团在和当地党组织、李贞乾部联络后，决定联合打击伪军王献臣部。

12月27日，王献臣率伪军4000余人向二总队发动进攻，很快攻占了崔庄、韩庄、汪楼等村庄。王献臣见二总队抵抗并不激烈，便于第二天集中兵力向二总队阵地发动猛烈进攻，企图一举“吃掉”这支抗日武装。二总队指战员在李贞乾的指挥下坚守在十字河地区顽强反击，给敌以重大杀伤，并派人将敌人的动向及时报告给六八五团。

29日凌晨，六八五团突然出现在崔庄西北，并迅速发动攻势，很快击溃王献臣部的顽抗，迫使一部伪军投降。另一部伪军向南溃退，被六八五团第三大队和二总队前后夹击，很快被歼。驻丰县县城的日军乘汽车驰援，又遭到第三大队和二总队的坚决阻击，在被毙伤60余人后仓皇撤走。此次战斗，六八五团和二总队密切配合，共毙伤伪军近900人，缴获大批武器弹药。王献臣虽侥幸逃脱，但其部属丧失殆尽，此后不得不改任“文职”。

1939年1月，根据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，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，由李贞乾任支队长。不久，挺进支队与六八五团合编为苏鲁豫支队，李贞乾任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。

红色足迹

红一师取得杨平口大捷

金阁

1930年4月，中共鄂豫皖特委决定按照上级命令，将红十一军分散活动的3个师改编为红一军。其中，红三十一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，下辖5个大队共800余人，由红一军副军长徐向前兼任师长。

5月，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中原大战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大批国民党军纷纷北调，这种形势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。6月，徐向前率红一师西出平汉铁路，根据侦察员的报告，发现敌人在平汉铁路南段的湖北应山杨家寨火车站兵力较为薄弱，仅有第二十军郭汝栋部的两个连防守，于是当即决定将此处作为打击的第一目标。

6月11日夜间，徐向前率领第一师由二郎店出发，一路急行军，向杨家寨火车站前进，并于次日凌晨3时抵达车站外围。红军战士迅速解决了敌人哨兵，打开寨门后悄无声息地冲进敌人营房，仅用一个小时，就将敌人两个连全部消灭，并占领杨家寨火车站，缴枪120余支和大批军用物资。

郭汝栋得到消息后不甘心失败，于6月下旬派出两个团向平汉铁路以东出击，企图搜寻红军主力“决战”。6月26日，敌独立旅第一团由广水进至大悟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。徐向前冷静分析后，决定红一师在敌人的必经之路杨平口设伏，消灭这股敌人。

28日晚，红一师从黄柴畈出发，经半夜急行军，在杨平口附近与孝感县游击队会合。红一师将主力隐藏在杨平口东北的傅家湾、新寨一带的山地，布成“口袋阵势”，然后由师直特务大队及孝感游击队一部进逼郑家店，诱敌出洞。

29日上午，红军诱敌部队在郑家店东北高地与敌人交火。敌团长发现对手是“小股部队”，于是倾巢而出。特务大队和游击队边打边撤，将敌人引入伏击圈。

10时，敌人进入伏击圈，随着徐向前的一声令下，隐藏在山坡上的红军一跃而起，埋伏在周围山峦上的红军主力立即发起猛攻，将一个团分割成三段。敌军遭到突然袭击，慌乱不堪，先头营和后卫营稍作抵抗便被红军迅速歼灭。敌团长见势不妙，带着中段的营，向傅家山一带逃去，占领一处高地负隅顽抗。徐向前率红军将残敌团团包围起来。在红军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的共同作用下，下午2时左右，敌团长率残部缴械投降。

此次战斗，红一师以与敌同等的兵力，歼敌一个整团1200余人，缴枪千余支，创造了鄂豫皖红军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。

华野十二纵淮沭路破“清剿”

常红

1946年10月，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，北撤山东，和山东野战军主力互相配合，转入山东战场作战。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在掩护华中军区后方机关转移等任务后，继续留在苏北坚持敌后游击斗争。

2月，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整编，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，下辖第三十四、第三十五旅和苏北军区第五、第六、第十一军分区，归华中指挥部指挥。华野十二纵指战员不畏强敌，积极与国民党军周旋并主动出击，连克国民党军驻守的多个据点，歼灭国民党军2000余人。

国民党军对华野十二纵的不断胜利十分惊恐。3月，国民党军在向山东解放区实施“重点进攻”的同时，为巩固其占领区，以部分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队对江苏省中部和北部地区进行“全面清剿”。华野十二纵以少数部队就地活动，主力跳到“清剿”圈外，积极打击敌人。4月初，国民党军被打得损兵折将，不得不停止“全面清剿”，退据点休整补充。

从4月开始，国民党军苦于兵力不足，不得不调整“战术”，将“全面清剿”改为“分区清剿”，派其整编第四十四师师长王泽浚率4000多人的兵力，“清剿”淮海区柴米河以北地区。华野十二纵首长经过研究，决定利用敌人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，组织三十四旅两个团及三十五旅，沿淮阴、沭阳公路发动反“清剿”作战。

4月15日清晨，三十五旅两个团的主力部队突然包围胡集据点，以部分部队阻击钱集方向的援敌，另1个团则配合三十四旅阻击十字桥援敌。经过一夜激战，三



十五旅主力歼敌330余人，战至15日下午，三十五旅攻克胡集据点，歼敌180余人，并击溃敌人的两路援兵。

16日，在十二纵的强大攻势下，钱集、徐溜之敌不敢继续防守，首先放弃据点逃窜。其他参加“清剿”柴米河地区的敌人也陷入极度恐慌，不久跟着放弃汤沟、汤沟、西马屯等据点，退回沐城。华野十二纵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乘胜追击，收复苏北的蒋坝、高良涧，随后在淮阴至沐阳间继续出击，消灭国民党整编第四十四师及保安团队的“清剿”部队各一部，打破了国民党军对淮沭公路的封锁。至此，淮沭路南起五里庄，北至十字桥，全为解放军所控制，苏北大片失地得以收复。

史海观澜

景梅九办《国风日报》

王贞虎

景梅九(1882—1961)名定成，字梅九，山西安邑城人，赴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，致力于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动。景梅九认为：“革命党人传达主义，全仗着书和报。”因此他于1911年初在北京出版《国风日报》。该报抨击时政，鼓吹革命，很快成为“北方革命言论之中心”“同盟会重要喉舌”。

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，景梅九回山西参加革命，被任命为山西军政府政事部长。1912年民国建立，景梅九当选众议院议员，赴北京参政并重办《国风日报》。他坚决维护共和政体，袁世凯称帝时，曾出一张无字白报以示抗议，结果《国风日报》被查封，他本人也因联络革命党人反袁被捕，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获释。出狱后，景梅九继续办《国风日报》，因反对张勋复辟，报纸又被查封。张勋复辟失败后，景梅九回到北京恢复《国风日报》。

1926年，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，景梅九前往陕西联络同志，准备响应。1927年“四一二”政变后，景梅九拒绝国民党政府高官厚禄的诱惑，回家乡潜心教学、编修县志。1936年西安事变后，景梅九拥护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、国共再度合作抗日的正确主张，在西安复办《国风日报》，宣传孙中山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。张学良被囚禁

后，《国风日报》又遭国民党当局查封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中共党组织为宣传团结抗日政策，由南汉宸等出面，帮助景梅九在西安复刊《国风日报》。景梅九吸收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，坚持宣传抗战，颂扬抗日将士，并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径予以谴责，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不断骚扰，经常被“半停刊”。抗战胜利前夕，该报因主编人屈士山病故一度停刊。

抗战胜利后，《国风日报》于1946年春复刊。在景梅九的支持下，该报对蒋介石、阎锡山撕毁停战协议、抢夺胜利果实的行径予以揭露，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高压、捣乱，于1946年8月被迫停刊。在景梅九等的努力下，《国风日报》不久再次复刊，但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捣乱破坏。对此，景梅九鼓励报社工作人员说：“我们应该和他们斗争到底，即使付出更大的牺牲，也不能屈膝投降！”由于景梅九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并任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，因而被国民党特务监视，行动受到限制，坚持长达30余年的《国风日报》也被迫“自行停刊”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景梅九担任西安市人民代表、陕西省政协委员、西北行政委员会参事等职，还受聘担任西北历史文物研究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李贞乾率部三打王献臣

贾晓明

编后拾遗

李贞乾，江苏省丰县李新庄人，1927年任丰县师范校长，因保护进步学生，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不满，将他调任丰县中学校长。1935年春，李贞乾结识了中共徐海蚌特委委员兼秘书孙叔平。在孙叔平的帮助下，李贞乾潜心研读进步书籍，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。1936年8月，日军侵犯绥远，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奋勇抵抗，李贞乾和孙叔平秘密领导了丰县的绥远抗日活动。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李贞乾在中共徐州特委的领导下，以丰县中学为基础，组织了“青年抗日救国服务队”。12月，通过中共党组织的工作，丰县成立了抗日动员委员会，李贞乾被选为委员。为了支持抗日，他捐出自家和本族的枪支弹药和积蓄，又卖掉21亩水浇田。1938年春，经中共徐西北区委书记王文彬介绍，李贞乾加入中国共产党。5月，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丰县抗日游击队第六中队在李新庄



李贞乾

成立，李贞乾出任队长。

6月中旬，在中共苏鲁特委领导下，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队在丰县成立，李贞乾任总队长，王文彬任政委。当时，二总队经常在李贞乾家乡李新庄一带活动。各区情报站送情报，各地报名参军或有事找部队，都要先到李新庄联系。李贞乾动员全家26口人站岗、放哨、送信、烧水烧饭，竭尽